



荆楚文庫

沈祖棻集

沈祖棻 著

荆楚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

武漢大學出版社



荆楚文庫

沈祖棻集

沈祖棻 著

荆楚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

武漢大學出版社



荆楚文庫

沈祖榮集

SHENZURONG JI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沈祖榮集:漢、英/沈祖榮著.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3

ISBN 978-7-307-17435-1

I. 沈...

II. 沈...

III. 圖書館學—文集—漢、英

IV. G250-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20316 號

責任編輯:李 程 胡程立

整體設計:范漢成 曾顯惠 思 蒙

責任校對:汪欣怡

出版發行:武漢大學出版社

地址:武昌珞珈山

電話:(027)87215822

郵政編碼:430072

錄排:武漢大學出版社

印刷:湖北新華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720mm×1000mm 1/16

印張:23.875 印張 插頁:6

字數:332 千字

版次: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95.00 元

ISBN 978-7-307-17435-1



9 787307 174351 >

《荆楚文庫》工作委員會

主 任：李鴻忠

第一副主任：王國生

副 主 任：梁偉年 尹漢寧 郭生練

成 員：韓 進 肖伏清 姚中凱 劉仲初 喻立平

王文童 雷文潔 張良成 馬 敏 尚 鋼

劉建凡 黃國雄 熊承家 潘啓勝 文坤斗

辦公室

主 任：張良成

副 主 任：胡 偉 馬 莉 何大春 李耀華 周百義

《荆楚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

顧 問：羅清泉

主 任：李鴻忠

第一副主任：王國生

副 主 任：梁偉年 尹漢寧 郭生練

總 編 輯：章開沅 馮天瑜

副 總 編 輯：熊召政 張良成

編委（以姓氏筆畫爲序）：

朱 英 邱久欽 何曉明 周百義 周國林

周積明 宗福邦 郭齊勇 陳 偉 陳 鋒

陽海清 彭南生 湯旭巖 趙德馨 劉玉堂

《荆楚文庫》編輯部

主 任：周百義

副 主 任：周鳳榮 胡 磊 馮芳華 周國林 胡國祥

成 員：李爾鋼 鄒華清 蔡夏初 易學金 鄒典佐

梁瑩雪 胡 瑾

美 術 總 監：王開元

出版說明

湖北乃九省通衢，北學南學交會融通之地，文明昌盛，歷代文獻豐厚。守望傳統，編纂荆楚文獻，湖北淵源有自。清同治年間設立官書局，以整理鄉邦文獻爲旨趣。光緒年間張之洞督鄂後，以崇文書局推進典籍集成，湖北鄉賢身體力行之，編纂《湖北文徵》，集元明清三代湖北先哲遺作，收两千七百餘作者文八千餘篇，洋洋六百萬言。盧氏兄弟輯錄湖北先賢之作而成《湖北先正遺書》。至當代，武漢多所大學、圖書館在鄉邦典籍整理方面亦多所用力。爲傳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湖北省委、省政府決定編纂大型歷史文獻叢書《荆楚文庫》。

《荆楚文庫》以“搶救、保護、整理、出版”湖北文獻爲宗旨，分三編集藏。

甲、文獻編。收錄歷代鄂籍人士著述，長期寓居湖北人士著述，省外人士探究湖北著述。包括傳世文獻、出土文獻和民間文獻。

乙、方志編。收錄歷代省志、府縣志。

丙、研究編。收錄今人研究評述荆楚人物、史地、風物的學術著作和工具書及圖冊。

文獻編、方志編錄籍以 1949 年爲下限。

研究編簡體橫排，文獻編繁體橫排，方志編影印或點校出版。

《荆楚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

2015 年 11 月

前言

沈祖榮（1883—1977），字紹期，中國圖書館學家，中國圖書館學教育的早期開創者之一。1883年沈祖榮先生出生於湖北宜昌一個貧苦家庭，1905年畢業於武昌曇華林的文華書院備館（中學部）。1907年就讀於由文華書院正館（大學部）昇格而成的文華大學，1911年獲得學士學位，並在韋棣華女士所創辦的公共圖書館——文華公書林任職。1914年，他受韋棣華女士的資助赴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學校學習，並於1916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理學學士學位，是為中國獲得圖書館學專業學位的第一人。1917年回國後，沈祖榮先生繼續在文華公書林工作，並於是年到全國各地宣傳美國圖書館學的理論、方法和技術，抨擊封建藏書樓的保守，一場席捲全國的“新圖書館運動”由此發起。

1920年，韋棣華女士與沈祖榮、胡慶生兩先生以文華公書林為依托，在文華大學創建文華圖書科，這是中國第一所圖書館學專門教育機構。1929年文華圖書科獨立成為私立武昌文華圖書學專科學校（簡稱“文華圖專”），由沈祖榮先生擔任校長。文華圖專西遷重慶後，在1941年創辦檔案管理科，開中國檔案學教育之先河。1953年，文華圖專併入武漢大學成為圖書館學專修科，沈祖榮先生繼續擔任教授。1977年在江西廬山逝世，終年93歲。

沈祖榮為發展圖書館學教育傾注了畢生心血，擔任文華圖專校長二十餘年。該校辦學極具特色，是自其開創後的近三十年中，國內唯一一所持續辦學的圖書館學專門教育機構。學校傳承著自強不息團結奮鬥、相容並蓄開拓創新和愛崗敬業服務社會的文華精神，享譽海內外。文華圖專歷經風雨而弦歌不輟，堅持辦學，校長沈祖榮先生一次次力挽狂瀾，使這所學校在政治風雲和抗戰烽火中一枝獨秀。學習西方而不崇洋媚外，繼承傳統而不厚古薄今，文華圖專在教育中貫徹了“教—學—研—用”

相結合的人才培養方式，注重教學品質。春華秋實，雖然辦學規模不大，但其畢業生遍及全國各大圖書館，甚至服務於海外，為我國乃至世界圖書館事業培養了一批批領導人才和技術骨幹，贏得學界和業界交口稱贊。也為文華圖專的繼承者——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當今國際地位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學生眼中的沈祖榮先生，在生活中如同慈父，愛生如子，親切關懷；在教學方面，則嚴肅認真，嚴格要求。在《國難與圖書館》（1932）中強調“辦理圖書館的人，有一件首先要覺得的，就是己立立人。那個意思，就是我們素來的造就、熏陶、鍛煉、培植所求的學問，所得的學位，不是為自己做招牌，乃是要為社會服務”。他在課堂內外都以身作則，深受尊重。他在《談談圖書館員的生活》（1934）中疾呼“為發揚我國文化計，圖書館事業實負有重大使命的！這樣一來，是越發使我們對於我們的信仰，相信無論如何不至於蹈空的了！”他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對圖書館事業的忠誠都使文華圖專師生深受感染。在教書育人之餘，他將自己的圖書館學思想傾注筆端，與學界相互探討，成果斐然。

沈祖榮先生在圖書分類和編目方面的成就歷來為學人推重。如他與胡慶生合編的《仿杜威書目十類法》在學習新技術編制圖書分類法方面具有劃時代的貢獻。在此之前，圖書館界的普遍做法是新舊書籍分別採用不同的分類法，這給管理和利用都帶來了諸多不便。而《仿杜威書目十類法》借鑒並突破了《杜威十進分類法》，將中西類目結合起來。圖書館學家杜定友先生稱其為“我國第一個為中文圖書而編的新型分類法”，蔣元卿高度評價這部書“首事創造，厥功極偉”，且“此法既係開山之書，較之近人著作，自為簡略，然其所設類名，後之師之者，頗不乏人。如語言文學之合併，劉國鈞氏及安徽省立圖書館，均仿其例。如哲學宗教之合併，杜定友、裘開明、陳子彝諸氏，亦依其法。此足見其影響於吾國圖書分類法改進之功，實未可泯也”。^①這部著作還引起了圖書館學界“遵杜”、“仿杜”或“改杜”等對《杜威十進分類法》研究的熱潮。沈祖榮先生在編目方面的研究成果與其相關教學相輔相成，

① 蔣元卿編：《中國圖書分類之沿革》，中華書局 1941 年版。

同時亦引領了學校師生在編目方面的實踐。他不但出版了衆多編目方面的論著，還將文華公書林的編目工作作為學生實習內容，組織相關的研究討論，從而促使文華圖專師生校友著力於解決當時圖書館編目實務中所遇到的問題，形成了《文華圖書科季刊》（後改稱《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和“文華圖專叢書”中一系列相關主題的成果。

作為我國最早一批圖書館學家中的佼佼者，沈祖榮先生在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史上功不可沒。他曾多次參加國際交流，將中國的圖書館事業發展介紹給世界，將國外先進思想、方法和技術引入中國。同時，他善於運用調查研究的方法，將中外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實際情況以資料和表格的形式展現，為當時和當今提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資料。1929年6月，第一次國際圖書館與目錄學會議在意大利的羅馬召開。主辦方是國際圖書館協會聯合會的前身，中國是其創始成員國之一。沈祖榮先生作為中華圖書館協會代表參會，在會議上宣讀了協會選送的5篇論文，其中包括其自撰的《中國文字索引法》，並將兩大箱圖書館統計圖表、圖書館學著作、美術影印片和古籍善本等在各國圖書館展覽會上展出，宣傳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和中國圖書館事業。會議結束後，沈祖榮先生受中華圖書館協會委托，在歐洲進行了長達兩個月的圖書館事業考察，遊歷歐洲意大利、德國、荷蘭、英國、法國、瑞士、俄國和奧地利等八個國家，參觀訪問了數十所歐洲著名圖書館，三所圖書館學校，以及和圖書館事業有關的圖書出版和銷售機構。歸國後，他以演講的方式和社會各界人士分享此次參會見聞，《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還全文刊載了其報告書《參加國際圖書館第一次大會及歐洲圖書館概況調查報告》。

沈祖榮先生的學術研究工作為文華圖專學以致用、中西結合和協作創新學術風格的形成和傳承產生了重要影響。白國應先生對沈祖榮先生進行了這樣的評價：“沈先生既是圖書館學教育的組織者、領導者，也是圖書館學領域的學術帶頭人。他在百忙中認真搜集資料，經過精心研究，撰寫了許多著作和論文，其中許多都是中國之首例，是經典之作。”

本書根據為“武漢大學百年名典”所輯的《沈祖榮文集》編成。該

文集編輯出版之前，原有丁道凡先生（文華圖專圖書館學專科班第九屆畢業生）搜集編注的《中國圖書館界先驅沈祖榮先生文集》。丁道凡先生所輯為沈祖榮先生在 1918 年至 1944 年之間陸續發表的 31 篇論文。這些論文在當時實不易得，丁道凡先生致函於各處，多方求索，精心收集。由於條件所限，丁道凡先生僅有少數幾篇原文的影本，絕大多數文稿都是親手抄寫而來。最後文集清樣由上海、杭州、南昌、武漢、重慶和成都的 12 位校友共同校對而成，並在書前附有沈祖榮先生的老友與早期門生的題詞。

在編輯“武漢大學百年名典”中的《沈祖榮文集》時，整理小組一方面以李鍾履先生（文華圖專圖書館學本科班第九屆畢業生）所編《圖書館學論文索引（第一輯）》（收錄沈祖榮先生論文 34 種）、《中國圖書館界先驅沈祖榮先生文集》和相關研究成果為線索，另一方面又從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圖書分館、大學數字圖書館國際合作計劃（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 CADAL）資料庫和國家圖書館等處，搜求原文，共收集沈祖榮先生於 1916 年至 1944 年發表的中英文章共 46 篇。在輸入時將繁體字轉換為簡體字，經過整理校對，編訂成書，力求忠實於原文，保留沈祖榮先生的行文風格，希望能夠將其思想與對祖國和事業的至誠之心傳達於當世。在此基礎上，“荆楚文庫”所收《沈祖榮集》以原“武漢大學百年名典”中的《沈祖榮文集》為整理底本，仍用繁體字進行排印，並加入了《仿杜威書目十類法》的內容作為附錄，以便讀者更全面地瞭解沈祖榮先生在圖書館學方面的思想，也可使這部當世罕見的分類法著作重現學者面前。

《沈祖榮集》整理小組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序 一*

《中國圖書館界先驅沈祖榮先生文集》問世了，值得慶幸。文集的出版，恰逢武漢大學圖書情報學院七十週年院慶，可以說適得其時。一九二〇年，文華大學興辦的圖書科，是武漢大學圖書情報學院的前身，從此開始了我國正規的圖書館學教育。一九二九年，圖書科單獨建校，定名為武昌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一九五三年，隨全國院系調整，文華圖專並入武漢大學成為圖書館學專修科。一九五六年，專修科改學制為圖書館學系。一九八四年，經原教育部批准，在圖書館學系的基礎上，成立了武漢大學圖書情報學院。從一九二〇年圖書科興辦開始，到目前的圖書情報學院，其所經歷的，是一段艱難的歷程，其間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三十年最為艱難。撫今憶昔，作為我國圖書館學教育事業的創始人之一，長期擔任武昌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校長的沈祖榮教授，在我國圖書館學教育事業上的卓越貢獻，是應當予以充分肯定的。

沈祖榮教授，是我國圖書館界的前輩，也是我國最早赴美接受圖書館學教育的留學生。一九一四年，沈祖榮先生在美籍人士韋棣華（Mary Elizabeth Wood，一八六二至一九三一）資助下，留學美國，一九一七年學成回國。他回國後，無論在開展宣傳和對中國圖書館狀況的調查，推進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方面，抑或是興辦圖書館學教育，開展圖書館學研究方面，都強調不要照搬外國，一直堅持走中西結合的道路。他在《民國十年之圖書館》（《新教育》第五卷第四期）一文中說道：“海外留學，所費不貲，遠涉重洋，談何容易？縱令虛往實歸，而橘枳變異，勢所必然。所學之件，在外國雖稱合法，在中國不能完全采用。由是言之，欲

* 本序言為原武漢大學圖書情報學院院長彭斐章先生為丁道凡搜集編注的《中國圖書館界先驅沈祖榮先生文集》所寫。文中提到的沈寶媛女士，是沈祖榮先生的女兒。——編者注。

推廣圖書館之事業，務須在中國組織培養人才機關，將來學業有成，可以充圖書館之應用。是以武昌文華大學於民國七年，首先組織圖書科。”從這裏也可以看出沈先生的愛國主義精神。

沈祖榮先生傾注了畢生精力於發展圖書館學教育事業。他作為一名教授，對教學嚴肅認真，發表了一系列論著。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兼授“服務道德”課程。他對檔案管理員的要求，是要與檔案共存亡；他對圖書館員的要求，特別強調要在開放的時間上，管理圖書的方式方法上，充分給予讀者以方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了適應當時教學的需要，很好地承擔開設俄文圖書編目課程的教學任務。他不顧自己年過古稀，對俄語並不熟悉等困難，通過自學，很快掌握了俄語，並編寫了《俄文圖書編目法》教材，邊教學，邊修訂，鉛印了三版，為學生講授俄文編目課。這種精神，給了學生們以極大的鼓舞。

沈先生孜孜不倦辛勤耕耘的文華圖專，如今已經發展為擁有圖書館學和情報科學兩個系，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和圖書發行管理學四個專業，一個圖書館學、情報學研究所，一個科學技術情報培訓中心，一個圖書情報現代化實驗中心在內的，既有研究生、本科生，又有專科生和成人教育的多層次、多規格、多種形式辦學的綜合的圖書館學、情報學教學和科學研究的重要基地。近年來，在改革圖書館學情報學教學體系，完善課程結構，深化教學內容，加強教材建設和師資隊伍建設，改進教學手段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成為我國最大的圖書館學情報學教育機構。沈先生離開我們十三年了，我的學長丁道凡先生，以退休後的古稀之年，從被“文革”摧毀過的幾個圖書館古籍部，搜集了沈先生的論著，並精心編注，這種精神，令人欽佩。深信這本文集的出版，對於今天的圖書館學教育和研究將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沈寶媛女士和文集的編著者丁道凡先生，囑我寫一序言，誼不敢辭。聊綴數語，以表我對沈老師的敬仰之情。

彭斐章 謹誌

一九九〇年六月於武昌珞珈山

序 二*

這本文集，是我的老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校長沈祖榮先生所著，並於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四年在國內公開發表過的文章。

我怎麼搜集到這些文章的呢？早在一九八四年秋，看了教育部辦公廳於一九八四年八月七日頒佈的（84）教編廳字 009 號關於編寫校史的通知後，我就希望圖書館界有一部系統反映文華圖專的校史問世，以供國內圖書館界同人研究參考。無如等了四年，還沒有看見。文華圖專是一九五三年全國大專院校調整時，合併於武漢大學，成立圖書館學專修科繼續辦下去的。近年，經過武漢大學領導和各級負責同志的努力，已發展為武漢大學的圖書情報學院。一九八八年六月，我帶上機關介紹信訪問了武漢大學檔案室。發現一九四七年春，由我和宋澤同志經手從重慶搬回武昌的原文華圖專的檔案，在“文革”中損失了十分之九（宋澤同志當時是圖專有文化的木匠師傅，他於一九四八年冬，參加了新四軍，目前是一位縣級機關的老幹部）。同時，沈祖榮先生的個人檔案也沒有了。剩下還不到十分之一的檔案，據說還是“文革”後武漢大學領導指示檔案室同志搶救整理出來的。至此，我才理解，等了四年還不見文華圖專校史問世的原因。

從一九八八年七月起，我開始搜集文華圖專校史資料和沈祖榮先生傳記資料。先從湖北省圖書館和浙江省圖書館提供的資料中，發現了我以前沒有讀到過的一些沈祖榮先生的文章。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次讀

* 此序言為丁道凡先生為自己搜集編注的《中國圖書館界先驅沈祖榮先生文集》所寫的序言。——編者注。

到了錢亞新老同學贈我的《杜定友先生遺稿文選》（初集）。與此同時，我又把《劉國鈞圖書館學論文選集》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十四篇文章重讀了一遍。我察覺到，沈祖榮先生文章的內容與杜、劉兩先生同時期的文章相比，有其相同之處，也有其不同之處。相同的原因，在於事業相同，在於為民族素質提高，為國家富強的奮鬥目標相同；不同的原因，在於各自的工作崗位有異，接觸圖書館學的時間早晚有異，對社會的接觸面廣狹有異。從而使我聯想到，作為沈、杜、劉三位先生的晚輩的我們這一代，如果想把近百年前期的中國圖書館發展史、圖書館教育思想史、圖書館學教育史、檔案管理學教育史弄清楚，就很有必要把沈祖榮先生的文章更多地搜集起來，加以編注重新發表。於是我又向北京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杭州大學圖書館和幾個老校友繼續搜集，結果，共得三十一篇。從發表的時間看，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六年，是國內軍閥混戰時期；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四年，是抗日戰爭時期。先是社會動盪不安，繼而是半壁河山破碎。敵占區，是哀鴻遍野，民不聊生；解放區和大後方，均過着不同程度的非常艱苦的生活。當此之時，四萬萬炎黃後代中，無論軍政、經濟、文教各條戰線，均有一部分人為了民族的生存，祖國的復興，不惜犧牲地堅守各自的崗位，苦撐大局。推算到文教戰線的圖書館學，很可以作為代表的，當數沈祖榮、杜定友、劉國鈞三人。三人中，最早投身於圖書館事業的，乃是沈祖榮先生。最早培育圖書館管理人才，繼而創始性地兼顧培育檔案管理人才，領導文華圖專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仍是沈祖榮先生。沈祖榮、杜定友、劉國鈞三位先生相處的關係，也是值得後輩效法的，他們始終堅持團結，堅持互相尊重。我的一部杜著《校讎新義》，是聽了沈祖榮先生推薦後才去買來的。我的一本劉著《圖書館學要旨》，也是聽了沈祖榮先生高度評價，才全部手抄下來的。劉國鈞先生主編《圖書館學季刊》時，多次向沈祖榮先生索稿。杜定友先生在《我與圖書館學教育》一文中寫道：“一九二一年，我畢業回國後，全國圖書館專家，只有沈祖榮、胡慶生二人在武昌主辦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其後，胡氏改業銀行。始

終其事的，惟沈氏一人而已。”這些表現，可以作為他們之間相互尊重的明証。

近十年來，我所接觸的原文華圖專的老師和老同學們，也一致希望有一部系統記敘文華圖專的校史和一部沈祖榮先生的傳記問世。經過初步交流想法，決定先由我來搜集資料，然後以適當的方式，或“先取衆謀而後獨斷”，或由幾個人合作，編寫出《文華圖專校史》、《中國圖書館界先驅沈祖榮先生傳略》各一本，編注《中國圖書館界先驅沈祖榮先生文集》一本，交出版社出版，廣為宣傳。宣傳的目的，主要是使它有利於繼承艱苦創業的優良傳統，有利於發揚愛國主義的精神，促使中國圖書館教育事業日趨繁榮。

目前，先出版的這本文集，反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四個年代國內圖書館的發展概況；反映了國內圖書館教育工作的思想概況；反映了圖書館學教育和檔案管理學教育的開創與推進的史實；也介紹了一些歐美和日本圖書館的概況，是一本珍貴的圖書館教育歷史文獻。讀者只要瀏覽一下，就會感覺到的。

為了便於閱讀，編者對於原來沒有標點的文章，補加了標點；對文中少數典故和歷史情節，作了必要的注釋。對於個別明顯的錯別字，作了改正。讀者發現錯誤時，希予指正！

丁道凡

一九九〇年六月

目 錄

CAN THE AMERICAN LIBRARY SYSTEM BE ADAPTED

TO CHINA?	1
《中國書目十類法》原序	13
中國全國圖書館調查表	14
《仿杜威書目十類法》新序	22
中國各省圖書館調查表	23
民國十年之圖書館	41
民國十一年之圖書館教育	52
提倡改良中國圖書館之管見	56
中學圖書館幾個問題	60
中華基督教教育聯合會圖書館組開會記	69
中國圖書館應採書本式抑卡片式	71
圖書館編目之管測	76
圖書館用不着雜誌麼	82
我對於文華圖書科季刊的幾種希望	94
在文華公書林過去十九年之經驗	97
中文編目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標題	108
國際圖書館大會述略——在漢口聖保羅大教堂講演	127
參加國際圖書館第一次大會及歐洲圖書館概況調查報告	134
西歐圖書館之沿革	178
西文編目參考書	183
調查江西省立圖書館報告書	202

MISS MARY ELIZABETH WOOD: The Queen of the Modern

Library Movement in China	205
韋棣華女士略傳	213
國難與圖書館	215
章譯《民衆圖書館的行政》序	224
圖書館所希望於出版界的	226
中國圖書館及圖書館教育調查報告	231
我國圖書館事業之改進	243
《普通圖書編目法》序	248
談談圖書館員的生活	249
MY IMPRESSIONS OF CHINESE LIBRARIES	256
《世界民衆圖書館專號》卷頭語	268
《中國十進分類法及索引》序	271
《圖書館的財政問題》序	273
LOOKING TO THE FUTURE	275
談圖書館專業教育	278
《世界各國國立圖書館概況專號》序言	289
中華圖書館協會第三次年會圖書館教育委員會報告	291
公立圖書館在行政上及事業上應有之聯絡	294
《標題總錄》自序	299
今後二年之推進圖書館教育	303
圖書館教育的戰時需要與實際	310
《圖書學大辭典》序	316
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近況	318
我國圖書館之新趨勢	321
戰後圖書館發展之途徑	326
附錄 仿杜威書目十類法	328

CAN THE AMERICAN LIBRARY SYSTEM BE ADAPTED TO CHINA?

To the ear of the West speaks the voice of the East! What future hand is to turn the pages of knowledge that China may read and send forth modernized relics of her arrested science and art? What she speaks for is the crumb from the loaf of educational benefactors; a penny from the world that she may return millions!

The library in China is the subject of my paper, for what factor could mean more to the advancement and civilization of a country, than these store-houses of stimulating volumes?

OLD CHINESE LIBRARIES

Libraries, in the old Chinese conception, are not a novelty, but they are considered such from the Western point of view. In China they meant a store-house where books were kept and hidden away, the main idea being to preserve the "literary treasure" of the country. The existence of libraries can be traced back in the official records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In the Chow Dynasty, for instance, Lao Tan, the founder of Taoism and the respected teacher of Confucius, served as a librarian and custodian of the archives in 553 B. C. Again, after the downfall of the first Chinese Empire, Liu Pan, the founder of the Han Dynasty, upon his victorious entry into the capital in 206 B. C., directed his minister, Hsiao Ho, to collect the books and state papers from the